

海宁文史资料



第 四 期

1992年45—48页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宁文史资料(四十五期)

目 录

- 1、纪念表伯张宗祥先生…………… 吴兴让(1)
- 2、遥想问松亭外树
——记张宗祥的怀乡深情 …………… 张劭能(11)
- 3、海宁的三代“红学家”…………… 朱明尧(13)

一九九二年三月

313/0201

纪念表伯张宗祥先生

吴兴让

1991年12月的一个晚上，海宁市图书馆馆长王国坚偕同施鸿同志夤夜来访，说是经张珏表姐的介绍，来向我征集冷僧表伯的文章、书法遗墨和生平轶事，以便补衮于1992年4月省、市举行的《张宗祥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资料之中。同时携来了省馆的活动计划和张珏表姐抄录的《张宗祥百衲小传》打印本。见闻之余，激动不已，连日来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因为我疏于才学，更拙于写文，何能膺此重任？然而张宗祥先生是我表伯，也是先父的文字世交。父亲一生不仅崇敬其为人，且酷爱其造诣至深的书法。这位著名学者、书家出在海宁，是我们海宁的骄傲，浙江的光荣。对于这样的一位名人，我作为稍有渊源的晚辈，只能不揣浅陋，写下麟爪回忆，以志纪念。

一、《百衲小传》和祝寿改革

看了珏姐写的《张宗祥百衲小传序言》使我立即想起了冷僧表伯对祝寿方法的改革曾经独树一帜。按照我国民间旧习，无论是对生人祝寿，抑或纪念前辈生辰、忌日，主人总

是以酒菜待客，并以迷信色彩很浓的祭祀方式来纪念。而来宾则馈礼赠物，即所谓礼尚往来。在封建时代旧社会里，还有一些贪官、豪绅之辈，借“做寿”为名，行“打秋风”之实，猎取不义之财。以致民间有“严嵩做寿，照单全收”之说。然而冷僧表伯对此等陋习深为反感，在他六十华诞之际率先作了颇有意义的改革。他要求前来祝寿的弟子，各自写出平日所见所闻的感受文学一篇作为贺仪，其他一切免俗。其实，这种改革旧俗的思想早在其年轻时代，就开始形成了。

当时，单不庵（先父之师）、蒋百里和张宗祥三位学者，互相奉为知己，见了面无话不谈。1903年冬，单不庵先生慨然对张宗祥先生说：“母老矣，将博一官，以慰亲心。”然而张宗祥先生却回答说：“官者，天下至不洁之物，不庵不能为，亦不必为也。”他又说：“古之哲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曾闵之徒，无一命之荣人，到其今称其孝，彼奔走利禄之途者，始未尝无所操持，继且患得患失，日丧其真，降志辱身，以贻亲爱，岂足以称孝哉。由此可见，人子之所以慰其亲者，诚不在此也。”后来，单不庵先生采纳了这个意见，放弃了“习举子业”之念，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研究史地、格致等实用学问上，先后在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和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校理了许多重要史料，完成了不少著作，获得蔡元

培、马彛初、胡适、章太炎等学界巨擘的高度评价。

过了12年，即1915年春，单不庵先生又写信给张宗祥先生说：“本生母张太夫人六十九矣，将倾所积修金，治觞上寿，凡交游戚族，以诗文来视者则受之。”因而，张宗祥先生就专门撰写一幅中堂寿序，记载其事，并高度评价了单不庵先生以道义之财为母寿的崇高品德。（见《单老伯母张太夫人寿序》）张宗祥先生对这种祝寿的改革，不但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举，即使在当今九十年代，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张宗祥先生在年轻时就已洞察清王朝官吏的腐败现象，因而劝单不庵先生不要去捡这种“至不洁之物”。而对于孔子《孝经》里所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孝道，也有新的见解，他认为：“尊敬师长，孝顺父母，决不是奔走利禄而无一命之荣人，而是要为人民办实事”。因此，他一贯主张兴教育，创实业，弘扬民族文化。他的一生也正是这样做的。

二、童年书法鹤立鸡群

张宗祥先生的书法历史，可追溯到他的童年。因为他的两户外家长辈，均出自书香门第，精通书法，这对他影响很深。珏姐说他父亲十岁时见他的外祖父沈韵楼（张宗祥生父张礼和的岳父）写字就很感兴趣。又据我族《吴氏宗谱》记

载，张宗祥先生在1930年撰写的《吴仲珏公家传》一文，在后记中自述：“吴太夫人歿，宗祥年九岁，把笔学书，仲珏公见之喜曰：“此儿将来书法胜舅矣。”吴仲珏是我堂祖父，也是张宗祥先生的舅父（吴太夫人之弟）注，清代廩贡生，曾任侯补训导，当时是海宁、海盐一带颇有名望的学者，著有《杲堂集》，他思维敏捷，下笔倚马千言。其书法功夫极深，字体近似何绍基。因而能预言，这位外甥的书法将来胜舅。足见张宗祥先生童年的书法，早已鹤立鸡群了，而第一位发现这位书法天才的也正是吴钟珏先生。

三、先严酷爱的书法墨宝

我父亲不仅同张宗祥先生有表亲关系，而且他又是单不庵先生青睐的门生。由于单、张关系密切，因而他们之间也常有文字交往，父亲对冷僧伯的书法早就钦仰备至。早年，父亲见冷僧伯日夜苦练基本功，临摹各种字体，写出一手好字，而常将一迭迭写过字的尺薄纸（毛边纸）丢弃，深感惋惜。于是就有心收藏了一整套《柳公权玄秘塔碑》的第一次临本，将其装裱成册，收藏至今。这虽是第一次临本，但可看出其临摹水平之高。当年父亲曾将这套书法借给青年同事沈级生作临本，也命我在高校里临摹。虽然因我愚钝未能入此门道，但对冷僧伯这部手写的字帖，一直视为拱壁而珍

藏了下来。

1914年，张宗祥先生住在北京宣武区时，曾为单不庵先生泼墨挥写过五首《元微之西归》七言绝句四幅，笔势雄健，堪称佳作，父亲见了特别喜爱，于是单不庵先生就将此转赠给我父亲。以后，父亲又经常求请冷僧伯书写对联、屏条，父亲认为有保存价值的史料，必请其为之题字，所以得到的书法的字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楷书、行草书、还有临写颜三表字体的对联等等。总之，父亲对冷僧伯的书法，既酷爱钦仰而又珍惜宝藏。

四、才华横溢的水利行家

提起张宗祥先生的大名，不少人会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位现代书法家。”然而却不尽然。他不仅是一位大书法家，而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因为他的国学造诣很深，博古通今，无论历史、地理、经典著作或地方文献，无不了若指掌。而且也精于绘画，善于吟诗撰文，攻研岐黄妙术、编写配剧作品等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我国开拓新文化，发展教育、书画、文学和图书博物等事业，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张宗祥先生知识面之广，还不局限于此，因他精通我国地理知识，故在农业水利方面，又是一位精明行家。1950年

8月,他以69岁高龄,出席了浙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认真学习了《土地改革法》等文件,用心听取了筹备会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精辟的大会发言。这项发言,实际上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水利论文。当时全省正部署土地改革运动,张宗祥先生不失时机地把土地改革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详加阐述,强调要把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对关系到全局利益的湖田和沙田,建议省政府不要轻易分给农户。所谓湖田,就是太湖沿湖之田,沙田就是沿海之涂田。他说:“土改不是扒平土地,而是要发展生产。”因为“长江下游最大的水库是太湖,沿湖为苏浙两省农业最盛区域,沿湖各县,向来旱则可以引太湖水倒灌,水(涝)则可以放洪流入太湖,水旱均无问题。自从逐年淤塞,设圩建堤,圈为良田,人与水争地,使水无所归……”因而,他建议:“苏浙两省会同派遣水利工程人员调查测量,凡发现有碍水利的湖田,一律收归国有,以便疏浚。”他还列举了过去“由于洞庭湖水库不修,造成了1947年中国谷仓——湖南的水灾;洪泽湖水库的不够,造成了1949年淮、泗、沂、沐四水横流江北的水灾。”因而再三提请省政府对太湖周围的湖田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张宗祥先生对钱塘江下游沙田的形成和利弊的分析，也很符合客观实际。他说：“钱塘江下游的沙田，其涨落全视江水走势而定。江水原走中小门，则江北海宁等县、江南萧山等县皆有沙田出现。江水如改走南大门，则海宁沙田日涨一日，萧山沙田日坍一日。现时江水正走北大门，故海宁岂独沙田日坍，塘工亦亟亟可危。”为了百年大计，张宗祥先生曾大胆设想：用人力开通中小门，引导江水中流，“使南北两岸，皆庆安澜。”四十多年来，钱塘江江水的走势，正如张宗祥先生所预料，基本稳定走北大门，因而沙田南多北少。至于今后围垦海涂沙田，是否有可能出现南围北坍的趋势，尚待引起足够的警惕，因此，必须大力加固钱塘江北岸的海塘，特别是近年来围垦的盐仓海涂，危险性更大，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关领导和水利专家们的关注。总之，张宗祥先生在水利建设上的论断是卓有远识的。

五、平易近人，学者典范

张宗祥先生才华出众，名噪一时，但他并不以学者、名人自居，在为人处世方面，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他有位堂侄张访菴先生，按年龄却比张宗祥先生长三岁，也精于书法，有正、草、隶、篆书法全能之才，尤以铁线篆称绝。他们两人常在一起交流书法辈叙虽异却亲如手足。

1948年，张访菴先生不幸逝世，张宗祥先生悲痛难以名状，写了一首挽联“分虽叔侄，谊等弟兄，历劫喜归来，白发追随期永日；尔已长逝，我犹行役，余年知有几，黄泉离别不多时。”足见叔侄情谊之深。1963年春，我曾手持冷僧伯手迹去杭州拜谒，他高兴地接见了，同我一起拉家常，问乡情，当见我手捧其书作时，他笑着说：“留着玩玩”。当时他虽已是82高龄，但仍钻在书堆里，忙个不停。居室里除了一张床以外，高高的写字台上，堆满书册，墙壁四周挂满书屏和对联，我身临书香门第，更觉眼前坐着的又是身材魁梧，慈祥可亲的冷僧伯，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今天，纪念一代宗师张宗祥先生，更激励我们认真学习张宗祥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学习他一心为公、不为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忠诚教育事业、图书、文博事业和改革创新精神，学习他谦虚、求实的高贵品德，还要感谢他为弘扬我国民族文化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他的书画和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这份精神财富发扬光大。

注：张宗祥先生的生父张礼和，因其堂兄张锡麟（启人）未婚早世，其未婚妻即吴太夫人，受封建礼教束缚，守贞终

身，待张宗祥先生出生，即由其生父出嗣给张锡麟为嗣子，故张宗祥先生有两户外家。（见《吴仲珏公家传》及《张氏墓志铭》）

遥想问松亭外树

——记张宗祥的怀乡深情

张劭能

身居客地，情系故乡。张宗祥（任省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对家乡海宁是有深厚感情的。人逢知己话家乡，他在友人面前一提到家乡的今昔、风土、乡情等，格外精神，谈笑风生。他总是惦记着家乡，正如 1960 年为张惠衣画了一帧山水画扇面，并题诗一首：

平生最爱长松树， 今日画松连数山；
遥想问松亭外树， 时时应望旅人还。

诗中“问松亭”座落在硖石东山的半山坡，是个古朴、典雅、松树环抱的亭子，类同过路亭（已毁），画中群山蜿蜒，苍松耸立，即景生情，正如古人云：“远望可以当归，”心绪万千，吟下了怀念家乡的佳句。

张宗祥是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成名成家毫不在意、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收集抄校孤本、善本等古籍上，正如他《八十书怀》中说：“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视抄校为己任，孜孜不倦地干了一辈子，书案上放着“著书不

如抄书”、“手抄六千卷”(终生抄校九千余卷)两方印章,以示立志于此。在校抄中对故乡学人的著作,特别是一些手稿、孤本,更为关心。他69岁时油印的《铁如意馆手抄书目录》中有乡邦学人著作507卷,199册,均校抄成册,由浙江图书馆保存。他在保存乡邦文献上的功绩是受人尊敬的。

张宗祥心中有国家、有人民、有事业。他不仅在事业上对国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同时也把家乡和家乡事业搁在心中。特别是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在临终前嘱咐长女把硖石(仓基街)的故宅送给国家办儿童图书馆。84年其长女亲赴海宁办妥赠送手续,为父亲了却了一件生前未了的宿愿。

张宗祥享年84岁,于1965年谢世。他在海宁文化事业上的功绩和影响是很大的。“遥想问松亭外树、时时应望旅人还。”他思念故乡之情,何等深切,同样,故乡人民对他也是不会忘怀的。

海宁的三代“红学家”

朱明尧

涓涓细流，年深月久汇成江湖河泊。曹雪芹的文学巨著《红楼梦》问世二百三十余年，对它的研究汇成了“红学”。

“江山代有人才出”，海宁一地三代出了三位“红学家”。

前几年逝世的名闻海内外的红学家吴世昌（1903—1986，海宁人）教授，研究“红学”的著作甚丰。他生前是北京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院学术委员）、《红楼梦研究集刊》顾问、《红楼梦研究学刊》编委。在六十多年的古典文学教育与研究中，不论在国内还是在英国，他研究的基点都是《红楼梦》，成绩卓著的是“红学”。吴世昌在硖石求学以后，于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后入北京燕京大学读书七年，因为生活清苦，被称为“燕京布衣”，燕京英文系毕业后，被破格吸收为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教书，历任西北联合大学国方系讲师，中山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两年，他应聘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由该校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并任牛津、剑桥

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还被推举为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委员。留英近十五年中，他除讲授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外，悉心研究《红楼梦》。一九六一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巨著《红楼梦探源》（五卷本），按“五步”次序研究，即：钞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及续书探源。这部著作，是六十年代红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在海外《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影响，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故国风光好，久客心应碎”，一九六二年，他举家回到北京，在国内继续从事以《红楼梦》为主的古典文学教育和研究。一九八〇年，他又出版了《红楼梦探源外编》，其中收录了他从回国至一九七九年发表于国内外刊物上的二十余篇论文。直到逝世前，他晚年没有停顿研究《红楼梦》和撰写红学文章。自然，世昌先生除了是“红学家”外，又是现代作家、诗人和教授，他毕生的著作，约计有五百万字以上。

近代中国大学者王国维（1877—1927. 海宁人），其主要成就在史学、文字学、戏曲史和词学方面。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写的一万五千余字的《《红楼梦》评论》论文，使他同时成为当时的一代“红学家”。《《红楼梦》评论》最早以人文科学眼光评《红》。它虽然以消极厌世的叔本华哲

学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主旨。但是，也是他系统地否定了盛极一时的“旧索隐派”，以艺术典型观点分析了作品，肯定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伦理学价值为当时所无有，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例如，《《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是足为我国美术（艺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艺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为全体人类之性质也。惟美术（艺术）之特质，贵具体（形象）而不贵抽象，于是举（艺术概括）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人之名字之下。”

在“红学”史上，我国最早写出整篇专著，是海宁人周春（乾隆甲戌年“进士”，甲戌年为公元一七五四年）。他所写的《阅《红楼梦》随笔》，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在此以前，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大约在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已在《红楼梦》（《石头记》）稿本上作过批注、评论，同代人裕瑞在《枣窗闲笔》、永忠在《延芬室稿》中已有零星评论和记叙片言史料文字，但未有系统研究文章出现。周春《随笔》成书时，距曹雪芹逝世才三十余年。《随笔》为后世记录了乾隆五十五年“已传有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钞本与

八十回钞本并行”这一重大事实。甲戌本二十回前总批有称：“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即可反证脂砚斋据以过录的底本，不题名称《石头记》，否则何劳“仍用”两字。周春记录的信息提示后人，当年传抄那书已不名《石头记》，表明他见到和研究的是称名《红楼梦》的本子，从而推知早期就存在两种不同名的钞本，后复衍孳为两大版本系统。周春在《随笔》中还创议了“叙金陵张侯家事”之说成为索隐派的鼻祖。

从浙江海宁一地的三代三位“红学家”身上，可以窥见“红学”研究的历史步伐，也印证了当代一位红学家胡文彬关于“红学始盛于浙西”的看法，还表明了海宁确是历史上“人材辈出”的地方。

注：本文同题简稿八百余字文，曾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现据以拓阔增补，详作介绍。

作 者

一九九二年春